

第一章 导论

一、关于“体内”与“体外”的说明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著作，书名叫作《体外成长论》。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体外成长”可能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所以，开宗明义，需要先做一点说明。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在说到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改革时，常常简称之为“体制内改革”；在谈起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外的改革时，则简称之为“体制外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提倡、支持发展乡镇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的发展。这些改革措施，就被称作“体制外改革”。与此同时，人们在提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时，习惯称之为“体制内成长”，而提到非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时，则称之为“体制外成长”。由于我们是从改革与发展统一的观点研究问题的，制度因素被看作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变量，经济体制改革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措施，因此我们把对改革的研究视为对发展或经济成长的研究，把本书内容概括为“体制外成长”问题。

显然，所谓“体制内改革”、“体制内成长”、“体制外改革”、“体制外成长”并不是真正严格、科学的经济学范畴。因为，经济体制是

一个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由相互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全部经济关系组成的经济关系体系是一个整体。在存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及其经济运行机制、集体所有制经济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私有制经济及其经济运行机制的条件下，经济体制是由各种经济成份内部的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经济联系共同构成的。仅仅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经济关系并不能构成一种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之分。不妨大胆假设一下，也许是由于改革前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比重，在目前也仍占主体地位，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贡献，就有了“内外”之别、主次之分。也许是当人们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改革为研究课题时，仅仅把其它经济成份作为参考系，因而才有了“内外”之别。

但是，当人们清楚地了解了“体内”、“体外”的含义，并且有了统一的解释，也不必过于在称谓上咬文嚼字，可以使用“体内”、“体外”的说法。因为“体内”、“体外”的说法毕竟比较简洁，同时还提醒人们，全民所有制经济与其它经济成份之间既是有联系的，又是有区别的，应该注意研究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二、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统一

在这本书里，我们准备尝试从发展与改革统一的角度，提出一种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两个既部分重合、又不完全等值的经济学范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内容，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含义与经济增长比较起来，要宽泛得多。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有时人们把二者当作一个概念看待。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离开了以亚当·斯密、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再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抛弃了制度的分析。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仍然以制度分析为特征，与主流派经济学分庭抗礼，但在学术界以及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远远不及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而只注意纯经济因素的分析，探寻价格形成、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方面的经济机理和规律。在西方经济学家如索洛、多马、哈罗德、钱纳里、麦多斯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我们只能看到投资、储蓄、技术进步、结构变革等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度要素如经济体制、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被完全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方法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和理论背景。第一，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在这种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为卖而买和进行生产的经济制度下，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已经创造了比以往所有制度下生产力进步总和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进步。到了今天，与 200 年前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的富裕程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从 19 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证明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面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纷纷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发挥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市场机制为基本调节手段的同时，辅之以国家的有限干预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和严重程度大大减弱了，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战后以来几十年的稳定增长。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是理想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最能保证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制度安排。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常识，不必再去研究，把它作为已知前提，只要研究其它经济因素就可以了。于是制

度因素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视野中不见了。第二 这种研究方法有其悠久的学术传统。如果说在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中还有制度分析的话 那也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封建制度的进攻 如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和魁奈的再生产分析。一旦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不再成为问题时，资本主义制度就被当作“自然秩序”（魁奈的“自然秩序”说一直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青睐 来对待 是万古不变的理想王国。在庸俗经济学的早期 萨伊、西尼尔、詹姆斯·穆勒等经济学家还在努力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20 世纪的西方经济学似乎觉得连这种辩护都是不必要的了，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了追求自然科学精确性的、具有工具学性质的“经济学”（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家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不再叫作《政治经济学》倒是名实相符）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排除制度因素的分析，无论有多么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肤浅。因为经济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 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 相互依赖 又有利益矛盾的社会关系。比如人们既要相互提供产品、劳动 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竞争 在产品 & 收入分配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利害冲突。因此，不同的制度安排 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和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同样的现实资源会有不同的产出量。因而 不将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 这样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根本上说很难被认为是科学的。当然 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个结论断然否定迄今为止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认识价值。这是因为 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当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体制与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比较适应时，这时对经济体制以及如何变革经济体制的研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当然 如果人为地改变这种体制 使之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违背 则会阻碍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如我国 50 年代过早地将初级农业合作社改为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

就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影响了农业生产量的增长。这从反面告诉人们 经济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而当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严重不适应时，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就变得特别突出。这时 进行体制改革 就成为争取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 撇开制度分析的纯粹数量分析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说增长经济学的某些撇开制度变量的增长模型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是指在相对较为合理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 可以将制度因素从增长模型中抽象掉 这时其它变量之间的数量联系仍然是成立的。而把它应用在我国 目前可能不会出现模型描绘的那种数量关系。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研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不能不研究制度因素。从本质上说 对经济发展或增长而言 制度因素是一个内在变量。具体到我国改革前以及目前的情况 决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增长的首要因素，是我们能不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改革模式和一条可行的改革道路 建立一种合理的经济体制。因此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所谓发展的问题 也就是改革的问题。在这里改革与发展之间形成了高度相关的关系，改革的理论，就是发展的理论，关于改革的探讨 也是关于发展的探讨。鉴于改革与发展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可以把改革问题也看作发展的一个方面。所以尽管本书的研究既包含发展的问题，也包含改革的内容，并且主要是在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改革问题，我们却宁愿把我们的研究称作发展论或‘成长论’（罗斯托等人曾把‘经济成长’和“经济发展”作为等价的概念使用。如罗斯托曾著有《经济成长阶段论》是一部地道的研究经济发展的著作）这就是我们给本书取名《体外成长论》而不是《体外改革论》或《论体外改革与成长》的理由。

三、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几年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到什么样的特点 不少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我们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并且正由于我们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 而不是采取了突变式改革道路 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才有了巨大发展 改革才取得了巨大成功 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经济大衰退。

如果就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言 更明确地说 就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实是走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但是，如果不是用国有经济的改革来代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而是把研究的视野由“体制内”扩展到“体制外”就很难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是渐进式的。事实上 我们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大步行进的，从 1979 年到 1982 年 仅用两三年时间 从“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转换为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到 1984 年则基本上完成了这项改革 以公有制为主体 允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很快得到了贯彻并产生了巨大效应 在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与制度方面 改革的步子也是迈得很快的 关于发展“三资企业”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在短时间内作出 并公开发布予以实施。可以说 在我国“体制外”的改革不是“渐进式”的 而是“突进式”的。

“体制外”的种种改革所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改革也比较彻底、到位 进行得比较顺利 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似乎在纵览云飞，手挥五弦中得以完成，使得各级决策机构得以把主要精力转到国有经济的改革上来。然而，“体制外”改革所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吃惊的 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首先看农业方面。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鼓励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帷幕。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得1978—1984年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达到7.5%，而1970—1978年的农业生产增长却只有3%（《中国经济改革》沃尔特·加勒森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7页）。从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到1984年，只有5年时间，粮食总产量由约3050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4000亿公斤，增长了约30%（《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卷）从而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西方学者麦克米伦、韦利等，把农村经济增长的78%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9页）。再看看乡镇企业的情况。70年代末，我国农村社队工业在整个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不但规模小、产值低，而且生产的产品质量差、档次低，大多是对农产品的浅加工，或者是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农机具等。然而到了1991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由1984年的1000亿元达到了1.1万亿元，相当于1983年全国的社会总产值（由1953年的1000亿元到1983年的1.1万亿元用了30年），到1994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大约为3.9万亿元，完成工业产值3.09万亿元。乡镇企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40%左右，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8日）。显然，乡镇企业已经不是什么国有经济的补充，而是占了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就社会总产值来说，也是“五分天下有其二”。乡镇企业已经不是什么“偏师”，而是与国有企业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左右军”。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也在近十几年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在后面说明分析，这里就不再提供更多数字材料了。

实事求是地说,198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动的脑筋、花的力气要比花在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完善上的脑筋、力气大得多。围绕搞好国有经济,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办法,投入了大量投资、贷款,而相对来说,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想的办法、采取的措施,投入的资金要少得多。然而,结果如何呢?以乡镇企业为例,据有关方面统计,1978年—1992年,乡镇企业社会总产值年递增29.1%,大大高于同期社会总产值年递增11.1%的速度;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年递增28.3%,高于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3.2%的速度,比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年递增8—9%的速度高出约2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论坛杂志》1994年第11期王洛林文,《乡镇企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1993年,乡镇企业占用的贷款只占全国贷款总额的6.3%,然而乡村两级乡镇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高达976亿元,同期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797.55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22.4%。《经济日报》1994年12月18日,这的确是出人意料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单位和农民的创造”。那么,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在其中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甚至是预示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对这个问题,尽管已经有人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很不深入。至于从与城市国有经济的联系和比较中,触及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工业化道路问题的探讨,则更加不深入。在这本书中,我们要首先就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我国非国有经济的改革,即“体制外改革”,只用了很短时间,就使非国有企业具有了市场主体的基本性质,如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盈亏,面对市场实行生产经营等,并且这种改革所遇到的阻力较国有经济改革要小得多。这种现象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选择非国有

经济首先进行改革 固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 是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作出的选择，但这种做法是否恰恰反映了某种规律性的要求 有更深刻的客观条件与原因 联系国有经济的改革 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改革是否与现行利益格局以及我国政治体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与此同时 也对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些也是需要在本书中加以解决的问题。

四、国有企业改革状况及几点看法

国有经济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实行改革开放十几年来 尽管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 但国有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993 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 62.32% 国有资产总额 1993 年底已达到 34950 亿元 占工业资产总额的 69.5% 销售税金占 73.6% 利润总额占 54.92%。更为重要的是 在那些对经济发展有着关键影响的部门 如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能源、原材料、基本装备工业、高技术产业 中国有经济占据着绝对优势 或者全部是国有经济。因此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那么 国有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 不是没有分歧。但是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逐年下降，1993 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 1/3，1994 年曾一度接近 50% 这毕竟是事实。无论人们如何辩解 比如说从企业数目看 国有企业有近一半处于亏损状态 从产值看 则远远没有这样的比重 国有企业实行‘两则’以后，人为扩大了企业亏损面 国有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 自有资金占的比重过低 而利息又计入了成本 减少了实现利润 国有企业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益有一部分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单位 如此等等。但是 剔除这些因素 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国有经济发展状况是不理想的 国有经济还缺乏应有的活力 对整个经

济发展的贡献与它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而这一切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有企业体制上存在不合理的东西。因此，为了争取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增长，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充满活力和发展后劲，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国有经济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事实上，自 1984 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搞活国有企业，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与改革前比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最根本的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没有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进行独立决策、独立经营的权力，产权关系界定不清，对企业经营成果无人负最后责任，企业只负盈，不负亏，缺乏自我约束。总之一句话，国有企业仍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改革进行到今天，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仍然没有根本转变，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只限于“放权让利”的改革，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有关，与此同时，也与以往的改革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有关。比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国家明确规定放给企业的权力被各级权力部门截留，或者把下放的权力又重新收回。这是为什么？改革本来是有利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为什么却会遇到重重阻力，举步维艰？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何处？

经过十几年改革，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仅仅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是不能真正使国有企业实行机制转换，成为市场主体的。要使国有企业真正转换机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必须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产权关系，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机制合理、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法人。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改革，并达到十四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 国有企业就可以搞活 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问题在于 通过什么样的改革途径 才能达到上述改革目标 采用以前的自上而下、由政府部门推动的办法 是否仍然会因为种种阻力使改革走样或停顿不前 由于改革愈深入 对原来的利益格局冲击越大 触及的矛盾越尖锐复杂 因而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如果不能找到一种理想的、可行的改革途径，国有经济的改革的成功就很难保证。

经济学的研究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所谓规范研究 是要回答经济运动或经济现象‘应该怎样’的问题 而实证研究则是要回答经济运动或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在以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 规范研究多 实证研究少。经济学家总是得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结论，而很少就现实的经济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下功夫去分析、去探讨 结果得出的规范经济学的结论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比如就国有企业的改革而言 经济学家提出要真正搞活国有企业 应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即把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并且这种观点也已经为决策核心接受。至于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现实，我们的研究则很不充分。比如目前的利益格局是什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对现行利益格局进行哪些调整 会损害哪些人的利益 受到来自哪些方面的阻挠；目前我国的政治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处理这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到目前的阶段 要进一步改革主要依靠什么力量 国有企业的现状如何 有哪些历史包袱 如果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展开 会对社会安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必须真正摸清 预为之谋。不然改革会因为措施不当遭受挫折 并进而夭折。在本书中 我们将对以上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实证的描述与探讨。

五、“体外成长”理论概要

一种经济体制一旦形成 就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就以巨大的惯性运转着 要克服这种惯性 就要付出代价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就会引起或大或小的振荡。传统的国有制经济体制运行了几十年 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对待 来设计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与策略。在对国有制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之后 我们可以把“体外成长论”的主要理论内容概略地先交待一下。

1. 由于非国有经济以前占的比重很小，并且与政府官员的利益之间没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在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经纬网中是一条较细的线 因而“体制外改革”阻力很小 易于成功。而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正好处于需要非国有经济存在与发展 又为它们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这样一个阶段。具体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城乡工业并举，恰恰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因此当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恰当的制度安排时 非国有经济在十几年内获得了预料不到的大发展。率先进行“体外改革”促进“体外成长”实在是近十几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成功之处 与中国经济运动规律不谋而合。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且还为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今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作用。

2. 国有企业目前效益不佳、发展乏力，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不合理 因此国有经济发展有赖于深化改革 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3.“体内改革”将遇到更加顽强的阻力。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是由政府权力机关设计并一直靠政府推动的。但是改革的深入 结果

必然会直接削弱官员的权力 从而损害他们的利益 因而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在以往的改革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二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使人们仍然习惯于教条地从原则出发 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因而“体制内改革”还会遇到理论方面的障碍。三是几十年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许多历史包袱和负担，这些问题靠国有企业和国家均难以解决。

4. 以上这些障碍经过一个较长期的反复，经过不懈的努力，会逐渐得到克服 国有企业也会建立起合理的经济机制。然而那样就会丧失宝贵的发展机会，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不能再等待。

5. “体外改革”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启示，“体外成长”为采取另一种思路改革国有经济现行机制提供了可能。这就是将那些竞争性行业中经济效益差，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出卖给非国有企业 或者采取兼并、联合、共同组成股份制企业的办法 使原有的国有企业自然而然地转换机制。这将是一个振荡较小、较为平稳的机制转换过程。

6. 就目前非国有经济的经济实力而言，以上改革办法，完全有现实可行性。因为我们并不主张对所有国有企业都实行这样的改造或改革办法。相当一批产业的企业还必须保持全民所有制性质。

7. 未来的经济制度蓝图 通过“体外”改造“体内”的办法 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转换了机制，变成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或者混合经济 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在实物形态上变成私有制 价值形态归了国家。另外在非竞争性行业中，仍然保持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

8. 对“体外”改造“体内”的一些理论问题 我们将在最后给予回答。

9. 我们提出的“体外成长论”仅仅是一种探索 并不排除有更好的改革途径。它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检验。

六、本书导读

第一章介绍了本书的核心概念、研究方法及全书的研究计划，可以迅速浏览一下，决定是否还要读下去。

第二章从资源配置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并指出了关于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经济学假设的虚假性，与已出版的研究改革的著述相比较，在研究角度上有一定新意，但熟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章。

第三章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首先在非国有经济中展开并取得成功，而不是一开始就在国有经济中全面展开的深层次原因，这是别人没有全面做过的研究，值得认真阅读。

第四章分析了非国有经济十几年来迅速发展的经济、技术原因，尤其是重点分析了制度变革产生的作用。这是体现本书特色的部分。

第五章简要回顾了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分析了国有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这是转入下面的研究的必要环节，没有提供新知识，但是为分析的逻辑所需要。如果读者想了解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状况，可以读一下，否则，可以跳过去。

第六章研究了当前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种种障碍，分析方法及其具体内容有一定创新，是必须读的章节。

第七章研究了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和非国有经济改革、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最能体现本书特色的部分。读了本章，可以收到开阔视野的效果，并为阅读第八章作好准备。

第八章阐述了我们的有关政策主张，是全书的落脚点，前面和后面的分析都是为这一章服务的，不可不读。

第九章针对第八章的内容，对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

力图冲破已有的框框和研究方法，提出我们的独立见解，是书中理论色彩最浓厚的部分，建议读者认真阅读，并和我们就这些理论问题进行交流。

第二章 传统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从经济发展角度所作的分析

一、传统经济体制建立的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制度分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少数几个用他的思想影响与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之一。马克思的《资本论》通常被人们视为一部不朽的经济学巨著，但是也同时被人们视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经济学家把它当作经济学文献来读，哲学家把它当作哲学经典，逻辑学家认为它是一部充满辩证逻辑的逻辑学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不少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又认为它是一部以人道主义精神为主线的伦理学著作。

仅仅把《资本论》当作经济学著作来研究，它也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部以制度分析为其鲜明特征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集中概括，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发展理论。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时，是以经济发展理论。这里的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广义经济发展问题的，与成为西方经济学一个分支、专门研究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不同的面貌出现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一部

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著作。斯密提出的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下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即“经济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可以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经济的最大增长的论断；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进步的伟大杠杆的论述等，至今还是经济学的公理性常识。不仅如此，亚当·斯密是以整个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把人与人的关系纳入了经济发展的分析，即采用了制度分析的方法。如斯密关于分工的分析关于生产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的分析就是一种制度的分析。因此可以说，亚当·斯密在建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同时，也开了制度分析的先河。应该说，在一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弃了斯密的传统，摒弃了制度分析方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排斥在经济学的分析以外，经济学家仅仅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探寻价格形式、经济均衡或非均衡的规律。在他们的分析中，虽然也有对人的分析，但要么是把人和本土、土地一样对待，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源，要么仅仅把人当作“经济人”，研究他们的行为规律，而不是当作“社会人”来对待，深入探究他们之间的不同社会关系，诸如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存在着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但是第一，它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第二，它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相比较，还停留在较肤浅的层次上，不能深入到社会的本质关系。

真正继承了亚当·斯密制度分析传统，并把这一分析方法发扬光大，在科学研究上作出最伟大贡献的，是马克思。一部《资本论》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固然与他同情无产阶级的境况，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深恶痛绝有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是，《资本论》的结论决不是感情用事的结果，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的制度分析，发现这种制度发展到 19 世纪